



三北讲坛

余巨平 / 主编

SANBEI
JIANGTAN

文化与价值取向	江德兴
哲学与人生	周国平
构建终身学习体系和学习型社会	郝克明
文化认同与传统文化的重建	刘梦溪
载人航天与应用	张厚英
中国文化史	余秋雨
半部《论语》治天下——国学、企业和人生经营的艺术	刘灿樑
永乐大帝	商 传

听历史文化，思世界风云 讲坛开讲，名家云集，叙述文明

江德兴 周国平 郝克明 刘梦溪 张厚英
余秋雨 刘灿樑 商 传

精选一批有特色的、有影响的演讲，以录音为底本。整理成书时秉持实录精神，不避口语色彩，保留即兴发挥成分，力求原汁原味的现场氛围。希望借此促进校园与社会的互动，让课堂走出图书馆围墙，使普通读者也能感知并进而关注当代图书馆知识、思想与学术的进展动态和前沿问题。



甘肃人民出版社

三北讲坛

余巨平 / 主编



SANBEI
JIANGTAN



甘肃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三北讲坛 / 余巨平主编. -- 兰州 :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14. 12
ISBN 978-7-226-04729-3

I. ①三… II. ①余…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306337号

出 版 人 : 吉西平
责任编辑: 张 菁
装帧设计: 马吉庆

三北讲坛

余巨平 主编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甘肃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 16.5 插页 2 字数 274 千
2015年6月第1版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 100

ISBN 978-7-226-04729-3 定价: 40.00元

目 录

contents

- 001/ 江德兴 文化与价值取向——中西价值观比较
- 019/ 周国平 哲学与人生
- 049/ 郝克明 构建终身学习体系和学习型社会
- 081/ 刘梦溪 文化认同与文化传统的重建
- 105/ 张厚英 载人航天与应用
- 131/ 余秋雨 中国文化史
- 169/ 刘灿樾 半部《论语》治天下——国学、企业和人生
经营的艺术
- 225/ 商 传 永乐大帝



文化与价值取向 ——中西价值观比较

WENHUA YU JIAZHI QUXIANG

ZHONGXI JIAZHIGUAN BIJIAO

江德兴

Jiang Dexing

时 间：

2007年9月29日

地 点：

慈溪图书馆报告厅

嘉宾简介：

江德兴，东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多年从事中西文化比较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著有《马克思的现代社会发展理论》、《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社会理论与政治权力的演变》，编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美学原理》等。曾获江苏省首届教学名师奖、江苏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江苏省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

各位朋友，早上好！很高兴能到慈溪来，和大家交流一些想法和看法。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化、思想的发展也必须跟上，因为这两者是密不可分的。思想、文化，看起来是无形的东西，但是它在实际的社会经济发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说，我今天想要和大家讨论的关于价值观的问题，这似乎是每一个人自己的一种取向，或者说价值取向，但是它对整个社会、对每一个人的行为却起着极大的作用。它是一个民族发展的一种重要的力量。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经做过一个研究，研究为什么近现代资本主义在三百余年来取得了那么大的进步，跟传统社会相比，就像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讲的，就像从地下呼唤出来的那么巨大的一种物质力量。通过他们的研究，他们总结出三条，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近三百年来之所以取得那么巨大的物质成就，肯定在这个社会内部存在着既不同于传统社会，也不同于东方社会的一些特有的激励机制。正因为有了这些激励机制，才推动它取得那么大的成就。通过总结，他们提出了三条：第一，就是有着非常明晰的私有产权。它的产权非常清晰。而清晰的产权，它有利于保护劳动者的积极性，有利于保护创造、发明。因为创造、发明的所得都是归他个人所有。第二条就是利益驱动。就是在这社会里面，它承认、尊重每一个人的个人利益，从而通过经济杠

杆来调动每一个人的聪明才智。第三条就是在这两条基础上所形成的竞争机制，优胜劣汰。正因为有了这三种激励机制，才使得这个社会充满活力。当然，它同时也带来了很多社会问题，比如社会不公、两极分化。但总体上来说，它是起着推动西方社会发展的作用的。那么，在这三条里面有两条涉及价值观。私有产权，它实际上就是以西方个体主义的价值观为基础的。所谓利益驱动，承认尊重每一个人的个人利益，这实际上也是建立在个体主义基础之上的。正是在这两个基础上，它才形成了竞争。也就是说，个体主义形成了西方特有的一种社会激励机制，通过在个人利益的基础上构造一种社会机制。实际上就是利益驱动，物质刺激。用经济杠杆来调动每一个人的聪明才智，就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社会”。每一个人的选择，每一个人的活动，他的出发点应该说都是他的个人利益。在西方看来这是出于追求幸福、个人的利益。但是我要获得很高的回报，我必须通过合法的手段，就是为社会提供有用的劳务或者有用的产品。我要获得更多，我必须提供更多。所以，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为社会做出了贡献。这实际上就是从亚当·斯密以来西方市场经济社会背后所蕴含的一种激励机制。

日本人很早就已经意识到西方式的那套管理不能原封不动地搬到东方来，他们在自己的管理实践中，也很清醒地看到任何管理的背后都蕴含着一种理念，蕴含着一种对人的基本假设，或者说看法。也就是说为什么西方会发展出那么严密的法治社会，发展出那些科学的管理理论、管理办法，实际上，它背后有着一种基本的对人的假设。也就是说假设人都是利己的，人总是追求自己的利益，甚至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假如没有一套法制，没有一套规章制度的束缚，人很可能为谋私利而不择手段。所以，不管你是经理，还是国家的总统，如果没有社会的束缚，没有其他权力的制约，你总是要谋私利的，总会干坏事的。实际上，它的整个管理的基本假设是在“人性恶”的基础上的。相反，东方传统不是这样的。我们晓得东方人，特别是中国人历来讲的是“性本善”。我们传统的管理实际上就是建立在“性本善”的基础上，就是说人都有良知的。我们只要通过启发他的良知，启发他的觉悟，通过做思想政治工作，就能调动他的积极性，就能进行管理。于此形成了我们传统的一些管理的办法，而且这个办法一直延续到现在，已成为我们党的一个传统。我们中国社会的传统就是

注重人的思想工作，应该说这样的出发点，对人的这样的一个假设也有它的长处。确实，人也有他“性本善”的方面。但是，我们现在也看到，仅仅根据“性本善”这个基础来建立我们的管理，来建立我们的社会激励机制是不够的。我们传统的大锅饭——平均主义，实际上跟这个也有关，也由此导致了我们的整个社会缺少一种活力。

那么，从这里，实际上也反映：虽然价值观好像是抽象的，纯粹是个人的选择，但它实际上影响到整个社会。而且，从一个社会的层面来看，不同的社会，它的价值观，或者说主导的价值观都是一样的，因为它是由一种文化所决定的。西方传统的经济学，它就建立在两个前提的基础之上。一个前提就是假设人总是利己的，人总是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第二个假设就是人又是理性的，人总是理性地从事着各种各样的选择，各种各样的活动的。正是在这样两个假设的基础上才形成了“经济人”这样一个基本的假设，它就成为整个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一个前提。无论是利己也好，理性也好，实际上都是西方的传统。那么，我开头说的，实际是在表明，不同的文化形成了不同的价值观念，而不同的价值观念就形成了一个社会不同的激励机制。我们通过分析不同文化的价值观念、不同社会的激励机制可以来反思我们的传统文化，来创新我们的传统文化，以适应我们现代社会的发展。这既是整个社会的事情，也是我们每一个个体所需要思考的问题。

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是不同的两种文化体系。但是为什么会形成这两种不同的体系，现在很难考究，或者说确切地去考究。有一种假设可供参考，就是认为东西方不同的文化传统源于它不同的起点，也就是说在文明开始的时候，东方和西方就走了不同的道路。所以后来就分别沿着不同的出发点发展成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对西方传统来说，人们都采用了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一种说法，就是它的文化产生于对外部自然的一种好奇、一种惊讶。古希腊人很早就意识到世界的千变万化、千姿百态。于是，他们就去研究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个多样化的世界，在这多样化的世界中间有没有一个共同的起源。于是就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论，像德谟克利特提出了“原子”，宇宙是由不可分割的原子组成的，像赫拉克利特提出了“火”，毕达哥拉斯学派提出了“数”，等等。于此形成了西方人向外探索的一种传统，向外求索，向

外求知。同时也形成了西方把自然跟人相分离的倾向，所谓“天人相分”。和这个相适应，古希腊为人类做出了一个很大的贡献就是民主制，主权在民。希腊城邦制度的一个重要的组织创新，或者说是制度创新，就是民主制。民主制的基础就是公民。中国历来只有市民，没有公民这个概念。而公民就是最早的一种个体主义价值观，或者说是价值观的体现。公民，实际上意味着这个人是一个独立的完整的个体，而所谓独立完整，就是说他既具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同时又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他是权利和义务的统一体。公民直接参与当时的政治生活，比如城邦之间是和平还是打仗，不是少数人关在屋子里讨论拍板，而是要召开全体公民大会。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公民都有权参与这个重大的决策。当然，一旦做出了某种决定，比如战争，那么每一个公民理论上都是一名战士，你必须要承担战士的责任。当时打仗是没有军费的，军费都是公民自己出的。你要带上自己的马匹，带上自己的武器，还要背上自己的干粮去参加战斗。这就是他的义务。这时候的公民就是权利和义务的统一体，是一个独立的完整的个体。这就是西方最早形成的个体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或者说是个体主义价值观的萌芽状态。但这种萌芽状态的价值观已经对当时的社会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

我们用比较直观的东西来做比喻。中国的建筑是木结构的体系，西方建筑是石结构的体系。东方建筑和西方建筑起码有两个基本的差异。第一个差异，就是西方的建筑都是单体建筑，一栋一栋的，独立的；而中国的建筑是群体建筑——四合院。四合院就是建筑的一个单位。我老家是苏州的，苏州小巷里面有很多古代的民居，文人的、官僚的和一些普通百姓的。进深很深，五进六进，一进就是一个单位，无非就是一个四合院。大户人家无非是若干个四合院串连起来形成的，所谓庭院深深啊，很大的一个建筑群。所以，中国的建筑单位实际上是一个群体，最典型的就是北京的四合院。而西方的建筑是独立存在的一个单体。所以，很多学者都提出来，为什么中国会形成四合院这种建筑样式，而西方是独立的单体建筑样式，这实际上是跟东西方的价值观念，跟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有关的。因为在他们看来，人都是一个一个独立存在的，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都是独立的世界。所以，建筑是人造的，建筑就应该跟人一样。而中国传统认为人应该是个相互的关系，是一个整体。这是一个差

异。第二个差异就是西方的建筑非常注重立面的处理，而中国的传统建筑在立面上在外观上的处理不做过多的装饰，大体上跟周围建筑保持一致。中国古代小巷里面的建筑大体都差不多，青砖灰瓦，式样一样，建筑风格也大体一致，最多好一点的人家搞一个门楼。像苏州、上海一带基本上是石库门。一个石库门实际上里面就是一户大户人家。中国建筑的富丽堂皇，你只有进了门才能发现。你在街上在外面是看不出这户人家究竟怎么样的。苏州东山有个雕花大楼，你在外部根本看不出它的雕花来，跟普通民居差不多。你只有进入它的大门，你才能看到精细的砖雕、木雕，才能见到它的富丽堂皇。甚至像北京故宫，你在宫墙外面根本看不到三大殿，你只有进入故宫里面，才能看到太和殿等，皇家气概才会扑面而来。这不仅仅是中国传统所说的“藏富”，而是一种价值观——跟其他人的关系，我应该保持大概的一致。相反，西方建筑它是单体，从而强调风格的多样化。因为建筑是人造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世界观，有独特的风格，所以建筑也应该追求独特的风格。因此，到了中世纪，甚至有的城市立下相应的法规，规定这座城市不能建造两座相似的建筑，它要求你风格的多样化。这种建筑上的差异的背后是价值观的差异。

另外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差别，西方从古希腊开始城市里基本上都有广场。广场，就是一个城市公共使用的场所，叫做共享空间。因为当时的民主是直接民主，开全体公民大会，就要有场所，没有现在的大礼堂，就是在广场上开的。在广场上，人们互相交流，在广场上人们做各种各样的买卖。广场就是人们社会交往的一个场所。由此发展出了西方人比较注重公共生活，注重社会交往。所以，拿破仑打仗打到意大利，发现意大利的广场，就说“这是欧洲最美丽的一个客厅”。而在中国，中国的城市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广场。城市里当然也有公共集会的场所，但往往跟某种庙观，跟集会相联系。我们南京有个夫子庙，现在有个鼓楼广场。实际上鼓楼广场根本不能算是广场。传统社会，大家集会的大概就是夫子庙。上海有个老城隍庙，苏州有个玄妙观（这是一个道观）。传统的集会都是通过庙会或者跟宗教活动有关的场所来进行的，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广场。天安门广场那是后来搞的，开始是个皇宫。所以中国历来的城市，它的重点不是在中心，而是在街道。对西方城市来说，广场就是一个市中心。到了中世纪，广场周边就建起了很多教堂。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又建立了很多市

政厅，建了很多购物大厦、宾馆。所以，市中心集中了一个城市标志性的建筑，是一个城市的核心。一个城市同另一个城市的区别，主要通过市中心来互相识别的。我相信很多人到过国外，老外通常带你去看两个地方，是让他们觉得很骄傲的。一个是带你去看广场，这是一个城市的标志，就是市中心。过两天，带你去看他的郊区。特别像欧洲一些发达国家，城乡的差异基本消失，乡镇也搞得非常优美、非常漂亮，田园牧歌式的景象。就是在这样一种观念的指导下形成了这样一种城市的布局、城市的设计。而我们中国，过去城市是以衙门为中心，比如北京以皇宫为中心。普通城市，它的市中心没有特色。我们现在搞的城市建设中的设计理念完全是从西方来的。现在有城市规划，规划的理论全是西方那一套。所以在这种规划下面搞的城市，特别是城市的市中心都千篇一律。你到南京新街口（南京市中心）看到的就是几个大商场，几个大宾馆。宁波市中心也就是几个大宾馆、大商场。你走在北京王府井，你感受不到这是北京，无非是比别的地方繁华一点。你到四川成都市中心走走，跟我们南京也差不了多少。这种统一的规划把城市的特色给泯灭了。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没有像西方这样的传统——以市中心作为城市的标志。相反，中国城市的特色是在小街小巷。所以我一直讲，你到成都的市中心是感受不到你到了成都的，假如你到成都的小街小巷，看到那么多茶馆，你最好到里面去喝喝茶，跟四川人摆摆龙门阵，你才能感受到这是到了四川成都。你到北京，你走在后海的胡同里，看到那么多四合院，你才能感受到这是北京。很多南京人想到苏州玩，苏州当然有个工业园区搞得不错，但是这看不出是苏州，体现不出苏州的特色。你想真正领略苏州，要去认识苏州，你必须到苏州的小巷里去。你走进那幽深幽深的小巷，最好是烟花三月，天上下着绵绵细雨，正好对面走过来一个撑着花阳伞的苏州姑娘。过去还有卖花姑娘，喊着一口苏州话。这时候，你的心都可能会醉了。就像大家读过的戴望舒的《雨巷》，看到一个像丁香一样结着愁怨的姑娘，这就是苏州。这样的城市布局实际上是跟传统的文化、传统的价值观有关。仅仅是萌芽状态的价值观就对当时的社会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我们通常所说的西方的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实际上是从近现代开始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物质利益的突出，这个时候，典型的个人主义价值观才开始。西方有个哲学家叫尼采，讲过一句话，“上帝死了”。什么意思呢？在中世纪，西方是被宗教

所统治的。而这个时候，宗教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慢慢开始淡化了。所以，每一个人只有靠自己，人只有对自己负责，没有谁能够来帮你，而自己首先要生存、要发展，就需要各种资源。所以这个时候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开始突出。也是在这个时候，个人主义价值观所包含的矛盾也显现出来。个人跟集体、个人跟社会的矛盾才开始显现出来。而且，这种矛盾贯穿西方文明的始终，成为我们去了解西方文明的一条重要的线索。

我们现在看西方很多著作，若不了解它的主题，会看不懂，不知道它在说什么。你只有晓得了它是要反映这样一个主题，这样一种矛盾，才能晓得这样一种状态，才能读懂它的著作。在法国有个存在主义哲学派别代表人物萨特，他写了一本小说叫《呕吐》。写什么呢？写一个人跟整个社会始终处于格格不入的状态，社会发生的一切都让他感到恶心，都有一种要吐的感觉。它反映什么？反映的就是个人跟社会的一种矛盾，一种冲突。

有一个很著名的现代派的代表人物叫卡夫卡，他写过一本小说叫《变形记》。你不晓得主题你根本看不懂。故事情节很简单，就写一个职员在公司里面犯了一点小小的错误，回家以后就担心老板什么时候炒他的鱿鱼。担心到什么程度呢？担心到睡了一觉以后发现自己变形了，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屎壳郎，在床上爬啊爬。家里人也把他当作一个怪物，把他关在家里，不让他出来。他只能沿着四壁慢慢爬，最后悲惨地死掉了。反映什么呢？这个小说写什么东西呢？实际是写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它是以一种极度夸张的手法反映了个人与社会的矛盾。因为个人始终敌不过社会，社会是一个庞大的力量。在西方，资本是一种庞大的力量。在这种力量的压迫下，使得个人发生变形，实际上就是扭曲。它是以人的形体的改变来表达人的心理上的扭曲变形。

还有一篇小说，很有名的，它很深刻地反映了西方社会的一种状态。写一个职工下班回家以后，他住的地方也是千篇一律的公寓楼，很难区别，只能用数字标识出。比如说，他住在三号楼，他在回家的路上发现有一个模样和他长得差不多的人也在往前走，他稍稍有点奇怪，觉得这栋楼里没有这样一个住户，但也没有在意，就跟着他走了。比如说这个职员住在301，他发现前面这个人也到301停下来了，敲敲门进去了。他老婆也不奇怪，也让他进家门了。那个人进门以后好像进了自己家里一样，衣

帽一脱，坐在沙发上，拿起报纸看报纸。而他的妻子就进厨房为他煮咖啡。这个人喝完咖啡，看完报纸，穿上衣帽又走掉了。这时候，这个职员就回家问他的老婆：“刚才进来的那个人是什么人啊？”他老婆很奇怪，就说：“刚才没有人啊，刚才进来的不就是你吗？”那个职员说：“不不不，我才刚进来，刚才那个人已经下楼去了。”这时候他老婆跟他说：“哦，原来我看错了，我把那个人当作是你了。”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每当这个时候，就是她老公下班的时候，而她老公下班的习惯动作就是衣帽一脱，坐在沙发上看报纸。而他妻子的习惯动作就是进厨房煮咖啡，所以看糊涂了。就这么一个事情，引起了他的思考。为什么妻子会把一个陌生人当作是“我”呢？在现代社会，“我”的独特性，不可被替代的独特性，好像失落了。他联想到了整个现代社会的生活，每个人的生活好像计算机编好的程序一样在活动。他联想到他每天早上刚上完卫生间，楼上的抽水马桶响了，人家也是在这个时候上卫生间。他吃过早饭拿起皮包，开门去上班，发现对面那个人也夹着皮包去上班。也就是说现代的生活对个体主义价值观是一种挑战，每一个人只是承担一个特定的角色。比如说，我在公司里是公关经理，那么你这个人只起着公关经理这个角色的作用。至于你是具有怎么样的个性，有什么爱好，你老板是根本不关心的。你只要把这项工作做好，而且随时会有另一个人来替代你。人和人可以互相替代。所以他感到一种失落，就是个人的独特性显示不出来了。但他又不甘心，他说我要想一个办法来显示我的独特性。想什么办法呢？他想明天上班的时候我带一包炸药，坐公共汽车的时候，车开到一半，我在汽车上引爆。这样的话，当天的晚报上可能会登出来“今天某某某在公共汽车上引爆炸弹”，由此来显示我的与众不同。想好以后，他就一边吃饭一边听广播，听到一半，听到一条消息——“今天，某某某在公共汽车上引爆炸弹。”他想：“坏了，我想了半天来显示我的独特性的办法又被人家占先了。”由此又感到一种失落。就这么一个很简单的小说，它反映了现代社会是在抹杀个性，是对个体主义价值观的一种挑战。

所谓爆炸，讲的就是一种时髦。现代社会当然有各种时髦，但时髦又经常会被模仿，模仿以后又会被批量生产，又会淹没在大众产品中间，这就是工业化的批量生产。那么，这些事例实际上说明，到了现代社会，个体主义价值观内在的矛盾才开始显示出来，由此形成了我们经常能听到能看到的“社会不公，两极分化”的一些现

象。但是它的积极面也是很明显的，它推动了现代社会的发展。

西方有一个很著名的社会学家叫马克思·韦伯，他一辈子就思考一个重大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思考为什么现代资本主义只能在西方产生，而不可能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产生。过去人们简单化地认为资本主义产生于商人的贪婪。做买卖的人很贪，通过贪婪他积聚了很多财富，慢慢发展出资本主义。他说：“不，世界上所有的商人都是贪婪的。”他说东方的商人不贪婪吗？犹太人做买卖那么精，也很贪婪。为什么在东方，在犹太人那边就没发展出资本主义，而只有在西方才能发展出资本主义？通过他的研究，他发现最关键的是在西方传统里面有一种世界上其他地方所不具备的特有的文化素质。什么素质？就是理性。他举了种种例子说明这种理性主义只有西方才有，东方是没有的。比如说建筑，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会堂，有这么大的空间，中间不需要一根柱子。他说这种建筑的结构是从西方来的。西方在罗马时代就发明了巨大的穹窿顶，跨度很大，中间不需要柱子。有机会大家可以到我们东南大学参观，东南大学有个很著名的大礼堂，是罗马式的，空间比这个还大得多，中间没有一根柱子。它运用的就是一种力学原理。这就是一种理性行为。中国的宫殿可以很大，比如太和殿很大，但它必须要由一根一根柱子来支撑，它就不懂得运用力学原理。他说这就是西方特有的一种理性精神。

另外比方说绘画，西方人讲究的是焦点透视，中国的山水画是散点透视。而所谓焦点透视，就是把视觉原理运用到绘画上，远的看上去就小，近的就大。所以，我们看西方的油画跟真实的现实生活是一模一样的。相反，中国的山水画是不讲究比例的，一座山，山上有个亭子，两个人在亭子里下棋，无论人跟房子也好，还是房子跟山也好，都不是按照比例、按照视觉原理来绘画的。所以，他认为西方的焦点透视就是一种理性主义，而中国的就是一种非理性。

另外，比如说企业制度。为什么会发展出工厂制度？这种工厂制度，这种劳动组织形式是西方人发明的，这是一种理性的、合理的劳动组织形式。而且关键是西方人能在这种劳动组织形式里贯穿或者是运用一种科学的理性的管理办法，有着非常科学、理性的簿记，就是会计制度。他说会计制度，东方也有，但东方人的会计制度实际上就是帐房先生的流水帐，进来多少，出去多少，赚多少。没有像西方那种科学的

簿记，没有合理的投入产出的分析、成本核算，中国传统里是没有的。所以，现在我们大学里的会计制度、会计理论，全部是从西方搬过来的。他说这个就是理性主义。当然，还有很多事例。

他说正因为这种理性主义，才促使了现代资本主义的诞生。书店里还能买到他的一本书，叫《资本主义精神与新教伦理》，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看一看。

那么西方这种个体主义价值观由于其内在包含的矛盾，也就慢慢地形成这样一个状况，或者有了这样一个渴望。什么渴望？就是对宗教的渴望。我们晓得西方人都是信基督教的，当然也有其他的教派，但基本上是以基督教为主导。实际上基督教不是西方人发明的，基督教是东方人——以色列、阿拉伯那一带的希伯来人发明的。但是希伯来人发明的这个宗教传到西方以后，没有几个世纪，就传播开来，就成为了统治整个西方人灵魂的一种精神力量。为什么那么奇怪呢，很快就统治了整个西方呢？

再来反观一下中国的情况，一比较就会发现问题了。中国也有类似的情况，也有一个外来宗教，就是佛教。佛教在中国要能真正的生根，被中国老百姓接受，有的专家认为经过了八百年的时间，有的则认为更长，是一千年。因为佛教从体系上来说跟中国传统是不一样的，不容易被中国人接受。我们都知道唐僧取经，回来以后组织了一个很庞大的班子来翻译佛经。但是翻译后，并没有普遍流传，仍然只是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传播。而且佛教有着很严格的戒律——“十戒”。你在家当个居士，你也要接受“五戒”，所以老百姓很难接受。当然还有一些严格的繁琐的宗教仪式。所以在历史上，长期以来是被中国文化所排斥的。所以才有了几次灭佛的行动，但是没有消灭掉。没有灭掉，那么中国文化就采取另一种方式，就是把它同化，慢慢同化，也就是用中国的传统文化去改造佛教。所以佛教被中国文化改造，真正成为中国化的佛教，一般认为到了宋代，出现禅宗后，才开始中国化了。而这时候的佛教跟印度的佛教相比已经是面目全非了。我们不需要那么严密的戒律，你只要心诚，一个老太太买串佛珠，整天在家里念念阿弥陀佛也是信佛。若你没有空出家，在家里面当个居士也可以。劳动人民成天忙于生计，没有时间去参禅拜佛都没有关系，你只要心诚，挑水砍柴都是在做功课，都是有效的。甚至你实在太忙，没工夫做这些也没关系，你遇到

什么重大情况、紧急事件，临时去抱抱佛脚也是好的。所以俗话讲“临时抱佛脚”，就是由此而来。这样一来，中国人才慢慢接受。这样的佛教还比较通俗，比较容易去贯彻，才在中国生根。

而基督教在西方则是很快被接受了。这里有着一种文化的差异，就是在西方文化里有着个人跟社会的矛盾，那么对个体来说还有感性跟理性的矛盾、精神跟肉体的矛盾。人要追求某种理想，要有某种精神追求，但是又被我的肉体的需要、感性的需要所束缚。那么这个冲突怎么解决呢？宗教就为它提供了一个方案，当然这不是一个科学的方案。这个方案就是《圣经》上讲的，你要成为一个完人，你必须抛弃你的一切。就是主张禁欲，把一切奉献给上帝。虽然不是一个科学的办法，但毕竟给人们带来了一种安慰——我可以去忏悔，通过忏悔让我的灵魂得到安宁，虽然我没有解决这个矛盾。

所以简单比较一下就可以发现，西方人信教跟中国人信教，情况很不一样。中国是一个很现实的民族，很多人信佛，或者很多人去庙里烧香拜佛，他的目的主要是请菩萨保佑，也就是说菩萨是为人间服务的。我跪在它面前干什么？是为了让它保佑我升官发财、一家人平安。相反，西方人进教堂，他的目的是忏悔，要求灵魂的超生——我在人世间做了很多坏事。虽然我赚了很多钱，但我赚钱的手段可能不正当，感到良心不安。因此，通过进教堂，进行内心忏悔，从而求得良心的安宁。

中国文化的特征是注重血缘。比如继承权，中国强调平均继承。家里有五个儿子，老头子死了以后就让五个儿子平均继承财产，长子可能略多一点，但基本上是平均分配的。那么，这个办法的问题在于他把财产分割了，不易集中，更不要说升值了。再大的家产，经不住你几代人的分割，就会由大变小。比如说我手上有一百亩地，我算是个大地主。假如我有五个儿子，我死了以后，五个儿子平均分配，每人只有二十亩地，马上成了中小地主。假如说儿子们还各有五个儿子，再一分配，每个人就剩下四亩地，马上成了贫下中农。所以在中国有一个说法，叫做“富不过三代”。在中国历史上，一个富裕人家能够延续三代的是极少数，往往一两代很富裕，到了第三第四代就败掉了，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有两类人特别多，一类是暴发户，通过各种手段暴富；还有一类是破落户，就是富和贫频繁交替。我们很多领导人都是破落户出